

## 第十二章 奔赴东北

### 濮阳转道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苏联出兵东北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八年抗战终于以我们胜利、侵略者失败而告结束。胜利来之不易呵，秧歌、腰鼓、火把、提灯，日以继夜的游行，——延安城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。胜利之日，唤起人们对难忘岁月的无限追忆，“八·一五”这个日子，在中国人民的历史长河中，永远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。

抗日战争胜利，并不意味着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，和平和内战两种前途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。在党的“七大”上，毛泽东同志作了《论联合府政》的报告，对抗战胜利后我党采取的政治方针作了全面的论述。我党极力主张建立联合政府，使中国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。但是抗战胜利了，抗战中退避峨嵋山的蒋介石，这时却以合法身分下山，迫不及待地来摘桃子。他一面命令八路军、新四军原地

待命。一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调运兵力，抢占大中城市，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，与此同时，又玩弄和谈阴谋，在八月份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。

当时在延安，耳闻目睹蒋介石的丑恶表演，干部战士都愤恨之极。连老百姓都说，蒋介石邀毛主席去谈判，“是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没安好心。”七大以后，在各极根据地工作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和领导同志还没有离开延安，我和陈赓在一起交谈时，都认为，蒋介石又在耍政治流氓的手段了，在大革命时期我们都领略过他的这种手段。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战胜利前夕就预料到的，“国民党怎么样，看他的过去，就知邀他的现在，看他的过去和现在。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。”“中国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，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”。所以，面对蒋介石反革命两手的政策，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鲜明的提出，我们的方针是“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”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，争取和平民主，揭破蒋介石的阴谋。同时，号召八路军、新四军反其他一切抗日武装队伍迅速前进。收缴敌伪武装，接受日本投降，收复敌伪所占地区，扩大解放区。这样，在延安的各根据地的同志迅速返回各个战场，我们在延安工作的同志也抽调出一部奔赴各抗日根据地。这时，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决定我去山东极根据地工作，任命我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

八月二十三日，在离开延安之前，也是毛泽东同志赴

重庆谈判之前，我在延安参加了最后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，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时局和任务的分析。我记得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向我们提问，和平是不是可以争取？内战是不是可以避免？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很辩证的。他说，经过八年抗战，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，有了强大的解放区和军队，与抗战以前大不相同了。蒋介石纵有合法的地位，也不能不正视这一基本事实。再者，英、美、苏不赞成中国打内战，人民希望和平，我们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，也希望和平。蒋介石呢？暂时也不希望打内战，因为内部矛盾重重。兵力又分散。所以，毛泽东同志说，和平可能争取，内战可以避免。我们的口号是和平，民主，团结。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，避免内战。

另一方面，毛泽东同志又说，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，也不会改变。他只有用暂时和平的政策，以便争取时间，医好疮疤，壮大力量，将来消灭我们。尽管这样，我们还是要利用他暂时和平的政策。对蒋介石的批评，要逐渐和缓起来，将来怎样，看他的态度，要团结，也要斗争，有理有利有节还是今后的方针。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，这次去重庆谈判，我们提出了十四条，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。他说，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，甚至可能要打痛他，逼他承认这些条件。因而在最近两星期要进军，今后还有一段时期要进军，向日本占领地进军，夺取城市，发动群众，扩大解放区。要在

蒋介石、美帝国主义面前摆出一个中国的内战不是那么好打的态势，取得我们在谈判中比较有利的地位。以争取和平。

谈到这里，毛泽东同志笑笑，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，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。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。你们在前方打得好，我就安全一些，打得不好，我就危险一些。你们打了胜仗，我谈判就容易些，否则就困难一些。他风趣地说，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，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，失一批大的，另外，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。

在这次讲话中，毛泽东同志还语重心长地说，我们要准备走长期的、迂回曲折的道路，准备对付最大的困难。如果蒋介石应允了条件，我们就要暂时走法国的道路，戴高乐领导，共产党参加政府。那就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时期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就要用“洗面”政策，钻进去“洗面”，教育党学会做各方面的工作，教育中国人民到更觉悟的程度，然后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。当然，这条道路后来没有实现，这主要是由于后来蒋介石没有完全承认我党的条件，不久又撕毁协定，挑起了全面内战。至今回想起来，毛泽东同志对时局的非凡洞察力和考虑问题的深思熟虑，仍是让人十分敬佩的。

八月二十四日，延安是一个晴朗的天气，我们二十几个人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延安。同行的有刘伯承、邓小

平、张际春、陈赓、薄一波、滕代远等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同志，还有去新四军的陈毅等一些领导同志，林彪、我、江华等是去山东根据地的。飞机在太行山的东阳关机场着陆。这是我第一次到太行根据地。伯承、小平等晋冀鲁豫的同志打趣地说，我们到家了，请大家到家里作客，休息休息。由于形势紧张，为执行党中央两个星期内进军的指示，加上阎锡山正在组织向我根据地进攻，伯承、小平等晋冀鲁豫的同志很快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，部署迎击阎锡山的进攻，组织后来的上党战役。由于任务紧，赶时间，我们只能在八路军总部休息了一下，马上又动身赶路。

从太行山出发，没有火车，也没有汽车，基本上是凭两条腿走，好一些的时候有马骑，各根据地的部队和群众一程一程的掩护。走到河南濮阳，接到中央的电报，要林彪、我、江华、邓华、李天佑、聂鹤亭等一行原定去山东的同志，立即转道去东北。电报是“万万火急”的，目的是执行党中央“向南防御，向北发展”的方针，与蒋介石抢占东北，把东北建成我们的根据地。这是党中央根据形势所做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上的转变，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，虽然我们在路上难以了解更多的情况，但经验使我们感到执行中央这个决定是刻不容缓的。为了争取时间，我们日夜兼程。北上的这一路走得挺艰苦，那些天正赶上连绵的秋雨，道路泥泞，天总是阴冷阴冷的。下雨是坏事，也是好事，记不清是哪个同志开玩笑说，我

们两条腿不怕下雨，淋雨无非是洗个澡，可蒋介石的飞机怕下雨哟。雨天给我们争取了时间。十月上旬到达了山海关，东北局派人来迎接我们，这样，我们便乘火车顺利来到了沈阳。

## 投书东北局

沈阳是东北的第一大城市，此时还在苏军的控制之下，城防司令是克拉夫钦柯大将。先期到沈阳的彭真、陈云、程子华、伍修权、林枫等同志已经组成了东北局，我们见面以后，彭真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东北的情况，派人将我们安顿住下，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。十月下旬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，林彪任司令员，彭真、罗荣桓同志任政治委员，程子华同志任副政委，吕正操、李运昌、周保中任副司令，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副参谋长是我的老相识伍修权。

修权同志到东北早一些，开始一直为彭真同志作俄文翻译，与苏军打交道，了解情况多，给了我很好的帮助。修权同志告诉我，和苏军谈判达成协议，有一个存有十万多枝枪的武器库，可以交给我们。中央已决定调部队来，用这些武器装备部队。到十一月底，陆续到达东北的部队已有十万人，加上我们收缴敌伪政权，剿匪，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，部队迅速扩大。几十万部队的装备问题是一个大问题。这些新扩大的部队，接收了日本投降后留下的仓

库和苏军的一些支援，装备起来了，而我们从各根据地赶到东北的部队，则武器装备较差，有些部队干脆是徒手来的。象黄克诚同志的新四军三师，就什么也没有。当我们按照协议去苏军那里接收武器时，苏军却又不同意给了。这使我们陷入困境。

在那一个阶段，我们城市经验不足，急于扩大部队。往往在收缴敌伪土匪杂牌武装后，派进少量干部，进行简单的教育，就打出红旗，成为我们的武装，改造部队的工作做的不多，给一些敌特分子有机可乘，有些匪特武装自动把白旗换成红旗，混进我们的部队潜伏下来。后来，当国民党部队一进攻，这些部队整团整营的反水，杀害我们的干部，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。

初入东北，我们党内在思想上也不够统一。主要是以城市为主的方针还是以农村为主的方针，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解决。这个问题，在沈阳会议上有些争论，在抚顺会议上亦争论过。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。在沈阳会议前后，中央的方针是争取和平，准备内战，首先是争取和平。况且，形势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中，蒋介石采取的政策有一个明朗化的过程，我们对形势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，所以评价要客观。一九四五年底，中央《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》的指示下这，“让开大路，占领两厢”的思想愈加明确，仍旧有一部分同志不愿让出大城市，对中央准备从事长期艰苦斗争的客观形势认识不

足，这些希望我党我军能够独占东北，争取和平的愿望是好的，但与客观形势不相符。由于中苏友好协议的限制和蒋介石的合法地位，苏军准备沿北宁路、中长路将大城市交给蒋介石的接收大员的意向已很明显。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开始，在美帝国主义支援下，国民党从秦皇岛登陆的两个军，先攻占山海关，遂向北宁路猛进，不久占领了锦州。我独占东北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，这就决定了我党在东北与国民党展开的必将是一场长期、曲折、复杂的斗争。以后的实践证明，党中央“让开大路，占领两厢”的决策是十分英明的，我们也是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加深了对中央这一决策的认识的。

为了使部队适应即将到来的长期、艰苦斗争的需要，从十一月份开始，我在锦州、沈阳、四平、长春一线，以及在南满各地的部队中走了走，做了些调查研究。

在调查研究中，我感到我们虽然占领了中长、安奉路沿途的一些大中城市，但并不能说已经得到很好地控制和巩固。在安东地区，肖华向我反映说，部队少，装备劣，而国民党地下势力，伪、满、日的散军和警察，特务遍地都是，与之相比，我们的力量不足。在长春，周保中、陈正人同志向我介绍了部队的情况。我与在下边工作的同志进行了交谈，他们提出要坚守长春，有的同志还提出与长春共存亡的意见。这些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我感到，长春城内我军无主力，比较可靠的部队有刘健民同志的工人



武装几千人，其他收编的一些部队，斗争尖锐时靠不住，国民党在长春有地下军、宪兵、铁道守备队等，成分复杂。将来可能成为与我军抗衡的力量。在长春外围，虽九台有杨振华同志千把人，公主岭有苏梅同志三千余人，伊通有余克同志千把人的部队，力量亦显不足。周保中、陈正人同志都说，我们的指挥机关，作战计划，交通运输，后方工作，都没有很好的准备。工作的艰巨性是显而易见的。

更令人焦虑的是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不强，不能适应即将到来的艰苦斗争的形势。突出的是“新兵新枪，老兵老枪”的问题，也就是新收编的部队武器装备好，人的素质却不行；老部队人的素质好，武器装备却不行。两者都不能扬长避短，因此部队战斗力受影响。再加上我军初入东北，各方面的关系尚没有理顺，不少部队没有御寒的冬衣，例如黄克诚部队的三师三万余人，从南方赶到东北，不仅没有武器，也没有棉帽、棉鞋、大衣，就是迫在眉睫的事。我所到之处，同志们纷纷反映少装备、缺被装、粮食等问题。

十一月下旬，我回到沈阳。国民党正沿北宁路向我进攻，东北局决定撤出沈阳到本溪。临行前，彭真同志对我谈，东北百分之八十的物资在长春路，在国民党到来以前要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来撤退物资，重点是弹药、枪炮、被服、通信器材。在本溪、海城、辽阳、抚顺都要以撤退物资为主要任务，要突击一下。要在通化建一个我们的根据

地，准备作长期打算。就这样，我便出发到这些地方去组织运送物资，主要是武器装备。有些发放到主力部队，有些组织火车运到后方去。

十二月三日，我接到了东北局关于军事部署的电报，报据自己两个月来的调查研究，十二月六日，我起草了一个意见，对我军在东北的工作向东北局提出几点建议。

在建议中，首先我认为，东北的战争将是比较长期的，残酷的，较大规模的，以运动战为主的战争。这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相距不远，我们的力量在不断生长发展，又有铁路交通的方便，适于调动兵力等原因决定。因此，我们在兵力的部署上，部队的组成上，交通运输的掌握上，兵源物资的补充上，以及后方的建设上，部应当适应这一战略的要求。

关于兵力的部署，我完全同意东北局在南满组成两个战线的决定。当时，敌人进攻锦州的兵力只有两个军，而锦州到山海关一线的铁路，还在我军控制之下，敌人是不敢放胆向北深入的，主力可能暂时控制锦州，配合山海关进攻之敌，在北宁线上夹击我军。抑或迂回营口侧背，配合登陆部队，打通道路。因此南满将可能展开激烈的作战。在南满组成两个战线，对于阻滞敌人的进攻，对于我们争取东北有战略意义。我向东北局建议，东南满主力目前拟应集结于辽阳、辽中一带，同时将沟帮子到营口一线的铁轨彻底破坏，这样既可以对付营口方面之敌，又可策

应西南的作战。

在部队的编组上，当时东北的有些改编过来的部队，不仅没有战斗力，而且本身巩固都成问题。象抚顺独立旅，完全是一些散兵游勇编成的，既无老部队作基础，又无相当的老干部作骨干，是很不巩固的，不能作主力部队使用。相反，象三五九旅等这样的老部队，却得不到大量的兵源补充，装备也得不到改善，亦难担负起主力的任务。针对这些问题。我向东北局提出，在原则上应该确定对有基础、有战斗力的部队，尽可能的充实、扩大，有计划地调一些没有基础和战斗力的部队编进去，稍加整训，使之成为作战的主力。而对没有基础、没有战斗力的部队则应尽可能减少。同时要划定主力部队的扩兵地区，不断成立补充团。我认为，现在新成立正规兵团的时机尚不成熟，应该在创造和扩大根据地的情况下，扶植地方武装的成长、壮大，以这样的地方武装扩大成正规兵团，素质则要好得多，巩固的多。

对于东北的交通运输的掌握，我认为是关系军事行动的大问题。因为有了运输力量，就可以灵活的集中主力于任何方向，一个师可当几个师用。东北的铁路交通线比较发达。此时，许多铁路支线（如安奉路、抚通路、吉延路、延佳路以及西满的南北铁路）基本上在我控制之下，但是我们没有统一的管理，有些地方指挥不灵。例如梅河口这个枢纽站，车头、车辆都调不动，一个连长在那里说了算。

因此，我向东北局提出，应当规定管理机关，清查运输车辆，修整铁路，进行有计划的运输工作。同时，各个地区的群众工作也应特别注意在这些交通线的两侧做起，这样既可巩固交通，又可创造根据地。

对于大后方的建立问题，东北局已决定在通化设一个点，当时各个部队都收集了一些伪满遗弃的资财，可都是零乱的，分散于各地的。如果不立即调查清楚，集中于后方地带，有计划的分配使用，将会造成不可想象的浪费。我向东北局建议，除通化外，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应建立后方基地，如延吉、牡丹江、佳木斯、北安、通辽等处，以聚集大量的物资，恢复工业，特别是军事工业。在这些地方，不仅不应在工人当中扩兵，而且应从长春铁路各大工业区征集大批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去，根据需要建设新的工业，很快把这些地方变成我们的后方根据地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深厚的人力、物力来支持前方的作战，为长期的、大规模的作战做好准备。我的这些建议报给东北局后，得到了东北局的支持，并向中央作了报告。

十二月二十一日，中央回电指出，“请你们注意东北长期、永久根据地的建立。（以）及在通化、延长、宁安、东宁、密山、穆宁、佳木斯、嫩江、黑江、洮南、开鲁等地区，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，建立后方，建立工业，组织与训练军队，开办学技，以便能够源源供给前线，有如汉高祖之汉中。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，我在

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”，并指出，“目前你们部队和干部集中在南满长春路附近工作是对的……但必须同时加强长春路两边深远后方的工作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”，准备将来国民党大批到达东北后，平原情况严重时，“有巩固的后方，可以进退回旋，否则是危险的”。

根据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，也由于我提了一些建议，在大规模战争尚来打起来之前，除了做部队的整顿工作外，东北局决定分派我去做了一段时间的后方建设的工作。

### 为了建立“汉高祖之汉中”

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平定天下，统一中原，治邦立国，除了他的政治远见，多谋善断，知人善任等主观原因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他占据了富庶的汉中平原，有巩固的根据地，有充足的后勤保障。为了使中国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，党中央远见卓识，确定抗战胜利后在东北争取先机建立根据地，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巩固的战略基地，就象“汉高祖之汉中”一样。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，不仅要抓人，而且要抓物，要进行思想教育，又要组织生产，发动群众。特别是在我党我军不能独占东北的形势下，工作就更为艰巨。

我接受了东北局交代的任务以后，首先做了一些部队的整训工作。以老部队为基础，将新改编的部队的人、枪编入，

进行重点补充。这样老部队就新部队武器装备的优势，新部队就老部队人员素质和作战经验的优势，两方面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，成为确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。同时，从主力部队中调一批骨干进入新编部队，加强地方武装，逐步扩大成补充团，成为主力部队的雄厚兵源。一九四六年二月，我在岔路河参加了吉林省委扩大会议，用同样的办法，对吉林军区的所属部队进行了合编。我记得张启龙同志在会上讲到整编部队的意义时，讲得很透彻。他说“合编部队，就是为了加强新部队的骨干，增强老部队的武器、人员。这样，既保持地方部队，又充实主力部队，使地方部队主力化，主力部队地方化，增强战斗力。”

在部队整编的过程中，一九四六年初，我们的部队与国民党打了两个战斗，一是秀水河子战斗，歼敌四个营，获得了胜利；另一战是沙岭子战斗，我军虽有优势兵力，却没有取胜。战斗过程中，反映了我们部队的一些思想问题，如轻敌、厌战、怕艰苦、图享乐，想尽快休战，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，在干部、战士中都有，沙岭子战斗表现更突出一些。我记得一九四六年八、九月份我到四纵去，彭嘉庆、吴克华等同志向我讲述战斗经过，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。这说明抗战胜利以后，在新形势下，对于要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去争取胜利的问题，在部队中还没有统一思想。

这期间，我还到了朱瑞同志的炮兵学校。这个学校是

朱瑞从延安带来的，约有一千多人。我向朱瑞说，缺干部啊，打你的主意来了。我向朱瑞了解到，炮校这批干部中，营、团干部可以配备十个团，连排干部可配备十五——二十二个团。朱瑞对我说，抽调干部可以，但要给他补充学员。他对我说了他的办学计划，拟组织山炮、混合、坦克、防空、迫击炮五个大队。另外还要补充些装备、被装。我对朱瑞的雄心壮志很是赞赏。表示，炮兵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基地，在未朱战争中将很有威力，一定要想方设法保证。当即拍板，以一干四百人计算，先补充齐被服装具，从李运昌同志处调拨鞋、帽，其他也想法配齐。拨步枪一千六百枝，再拨几名教学用炮及器材。另允诺帮助物色炮兵校术、修械技术、兽医等专门人才，学员也立即补充。朱瑞十分高兴。朱瑞同志是我军炮兵工作的创始人，从延安开始就致力于这项工作，在东北是他大展才干之地，为我军的炮兵工作做出很大贡献。不幸在辽沈战役中牺牲，十分令人惋惜。

一九四六年二月，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，东北局先是搬到抚顺，又从抚顺移到梅河口。东北的战争越打越大，前方工作和后方工作的矛盾越来越突出，后方基地建设的紧迫性也越来越突出。在梅河口对，梅河口车站的物资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。损失重大。接受这个教训，为了把铁路运输工作搞好，在三月份，东北军区司令部下达缺路兵站工作的指示，借鉴梅河口的经验教训，确定：由后方基

地运往各兵站线的弹药资财务必分存小站（专运站）疏散荫蔽，随用随装。根据统一领导，分散管理的方针，在平（四平）梅（梅河口）线、梅（河口）辑（安）线、吉（林）梅（梅河口）、吉长（春）线、吉延（吉）线上组织了兵站指挥所和小的专运站。初步形成了一个交通运输网。

四月份，我来到通化。通化是东北局指定的后方根据地。这是一个不大的工业城市，局围资源丰富，有铁矿、煤矿，有兵工厂、货币印刷厂、银行、医院、仓库，是我们第一个后方基地。在通化，我主要调查了工业情况，以便组织军工生产。通化的同志向我反映，日本投降后，这些工厂不同程度遭到破坏，目前恢复开工了一些厂，还有一些厂设备不足，有的缺技术人员，有的缺原料。象炸弹厂虽已恢复生产，日产子弹一万颗，但原料缺，要补充。我向在通化工作的同志说明了东北目前的形势，以及通化地位的重要，和他们商量解决问题，恢复生产的办法。我将他们需要的物资一一记下，以便今后调拨。有个同志还向我献策说，长春的东北工业公司高崎以下的日本技术人员还都在，是否可以利用一下。还向我提供了附近煤炭分布、质量情况，我一一做了记录。这些建议我们以后都分别采纳了。我们在东北期间，利用了不少战后留下未回国的日本技术人员为我们服务。有工程技术人员、有医生、有汽车司机等，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例如我的司机高桥，就是在抚顺召来的，他以前是一个坦克兵，人不错，



一直到解放后才回国。还有一个在我身边工作的医生大久保，前些年来中国观光时还来看过我。在抗日战争中，日本人民同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。战争结束以后，不少人成了我们的朋友。对这些朋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。

五月份，在国民党的进攻面前，我军经过四战四平，阻止了放军的进攻，争取了时间。根据中央决定，东北局决定放弃长春、吉林、撤至松花江以北。我和杨志诚同志来到长春。在这里开了一个贸易公司理事会，铁路管理局、银行、卫生部、供给部都在一起凑了情况，准备车皮，将粮食等物资转运出去。当月，东北局迁至哈尔滨。这是国民党在东北进攻的顶点。

六月份，国共双方在东北达成停战十五天的协议，自六月七日起，停战生效。这期间，我们在白山黑水、松辽平原之间奔走，搞物资、组织运输、准备新的战争。七月初，我根据东北局的指示赶到哈尔滨，参加了东北局扩大会议。这次会议，总结了一年来的东北根据地建设的经验，在城市和乡村、战与和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。决定要准备以长期艰苦的斗争取得和平，号召共产党员走出城市，丢掉汽车，脱下皮鞋，到农村去做发动群众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。陈云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，“七七决议”就是他亲自起草的。在会议期间，东北局领导同志和我谈，要利用战争的间隙组织军工生产。目前，国民党已占据松花江以南，如果打起来，南北可能隔绝，再从北满

向南满运物资就困难了。所以要在南满抓紧搞军事工业。到大连看一下，能否也搞一个点。并要我抢在战争打响以前出发。于是，这次会议我只参加了一半，了解了会议的基本精神后，就和朱理治、杨至诚一起动身去大连。

我们到大连的时候，是八月初。首先在大连见到的是大连地委负责人韩光同志。大连在东北有着特殊的地位。按照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，苏联红军在大连长期驻扎并实行军事管制。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进入，我党有发展的有利条件。所以从进入东北以后，大连一直担负着东北的部分后勤工作。韩光向我介绍说，现在大连市公开的地方领导机构是大连市政府，市政府中基本上是我们掌权，象财经部衣钦堂、金则林同志，公安局长赵东斌、秘书长任仲夷、工会唐韵超都是我们的干部。但中层干部不足。我们在大连活动要打着合法的旗号，否则给国民党抓住口实，会给苏联的同志造成难堪。在这以前，东北局在大连向韩光订购了40万米布，150万吨纱。韩光同志告诉我，已经收了25万米布，75万吨纱了，任务完成的很快。

在大连，根据韩光的介绍，我向财经部衣钦堂、金则林同志了解了大连的工业情况。他们向我介绍说，日本投降以前，大连有工业两千余家，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份，恢复了三百余家，其中重工业47.2%，轻工业52.8%，商业现在恢复到三千家。我问他们，大连轻重工业都有，又有苏军掩护，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军事工业？他们说过去有些

军事工业的基础，可以考虑恢复，但也要秘密进行。我对他们说，大连的地理位置很重要，以后战争打起来，就更重要。大连军事工业搞起来，不仅可以支援东北，对华东地区也有很重要的意义。以后，我又在大连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调查研究。当时胶东派来的后勤工作人员刘振同志根据我的要求，对大连的军工情况作了调查，提出了方案，他就一直留在大连搞兵工厂工作。以后我再也没去大连。大连的军工生产搞得很好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了很大贡献。

从大连回到哈尔滨，大约是九月底十月初了。在停战四个月以后，国民党又重新在南满拉开了战幕。蒋介石亲飞沈阳，制定了“南攻北守，先南后北”的战略方针。妄图先吃掉我南满根据地，解除后顾之忧，然后全力进攻北满我军大本营。我向东北局汇报了大连的情况以后，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工作去向。此时，东北局贯彻“七七决议”，干部纷纷下乡，做建立根据地的工作，当时南满处于国民党进攻的前线，形势严重，陈云同志自很奋勇去南满工作。我考虑八年抗战自己一直留守陕甘宁，这是一个到前线工作的机会，便也主动援出去南满帮助一个时期的工作，以便很好的锻炼自己。不久，党中央和东北局针对敌人“先南后北”的战略方针和南满的严重局面，为了加强对南满的统一领导，决定派陈云和我一起去南满。十月二十七日，我和陈云离开哈尔滨，经牡丹江、图们取道朝鲜去临江。

途中，在宁安县境内的斗沟子车站遇险。斗沟子车站前方是一个陡坡。夜晚，我们的列车正停在车站，一辆货车在爬坡时，由于燃料缺乏，动力不足，从坡上滑了下来，眼看就要与我们的列车相撞。幸亏一个扳道工奋力扳开道岔，那辆货车就翻在离我们列车的两米处，铁轨被撞坏。我们耽搁了几天，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。